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一

中華書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 一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頤剛讀書筆記/顧頤剛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1.1

(顧頤剛全集)

ISBN 978 - 7 - 101 - 06850 - 4

I. 顧… II. 顧… III. 讀書筆記 - 中國 - 現代

IV. G7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14930 號

-
- | | |
|------|---|
| 書名 | 顧頤剛讀書筆記(全十七冊) |
| 著者 | 顧頤剛 |
| 叢書名 | 顧頤剛全集 |
| 責任編輯 | 俞國林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920 × 1250 毫米 1/32
印張 254½ 插頁 56 字數 5500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 - 7 - 101 - 06850 - 4 |
| 定價 | 890.00 元 |
-

顧頡剛全集

出版說明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民俗學家。顧先生早年收集民間歌謠,從事民俗學研究;1920年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畢業,始考辨古史傳說。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冊。1927年創辦民俗學會,編輯《民俗學會叢書》,次年出版《民俗周刊》。1934年創辦《禹貢》半月刊,後成立禹貢學會。抗戰期間創辦中國邊疆學會,出版《邊疆周刊》。並先後主編或參與編輯《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誌》等學術期刊。曾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等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通俗讀物編刊社社長、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等職。1954年始,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先後主持《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

顧先生在學生時代，即發願獻身學術事業，此後終其一生，孜孜以求。1923年2月，顧先生與錢玄同先生討論古史時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在學術界引起革命性震蕩。隨着《古史辨》的陸續出版，引起了當時學術界對古代史料真偽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為中國的史學研究開闢了新領域，促成中國史學步入新時代。圍繞着疑古學說、圍繞着“古史辨派”、圍繞着對中國古史的研究與探索，學術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和現象。

民俗學研究，是顧先生學術研究的另一大貢獻。顧先生倡導“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眾的歷史”，並以孟姜女故事來論證古史的演變，以考察東嶽廟諸神及妙峰山香會來探討古代神道與社祀，以歌謠來論證《詩經》是古代詩歌總集，拓展了民俗學研究的領域，奠定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基礎。

歷史地理與邊疆地理的研究，更是顧先生的重要貢獻。顧先生由《尚書》的研究，進入對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討論；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轉而側重邊疆地理與民族演進史的探索；為我國當代的歷史地理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並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抗戰期間，又轉入西北、西南，實地調查，考究典籍，以所見所聞之邊疆風尚證中原古史，破舊立新，為古史研究開闢新途徑。

顧先生治學一生，筆耕不輟，著述豐贍，發明猶多。將其一生著述進行全面整理，完整呈現，已成為學術界的迫切需求。

早在 1944 年，顧先生即意識到編輯文集的必要性。這一年，顧先生在重慶應史學書局之邀，著手編輯《顧頤剛文集》；後因史學書局創辦人病逝而未果，編輯工作也暫時停頓。抗戰勝利後，顧先生復員還鄉，生活稍稍穩定，又繼續文集編輯之事。至 1946 年年底，完成二百二十多萬字，並希望在六十歲時，能够“出一全集，保存一生心血”。1947 年，顧先生應文通書局之約，擬定編輯文集之五年計劃，包括古史與經學、歌謠與民俗、史學與游記、邊疆與民族、政治與教育、通信與自傳等，這是顧先生心中一份全面而理想的方案，可惜當時時局艱困，難以實現。

1955 年，顧先生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約，整理《浪口村隨筆》。並得于鶴年等人相助，於 1961 年 2 月編定《史林雜識初編》。後因出版社分工調整，書稿轉至中華書局，於 1964 年出版。自 1959 年始，顧先生應中國科學院與中華書局之邀，整理《尚書》。1961 年 8 月，中華書局金燦然、蕭項平向顧先生建議，除出版其《尚書今譯》和《史林雜識》外，更應將其一生著述編為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考慮到顧先生體弱多病，中華書局經四年努力，特調劉起鈞來京協助工作。後因“文革”爆發，文集編輯又告不果。

1978 年 9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請顧先生作《工作規劃》，其中就有“修訂已發表的論文和未發表的文稿，編成分類文集”的規劃。後中華書局又重申前議，顧先生即請助手王煦華擬編

《古史論文集》目錄；並於 1980 年 5、6 月間，親自編定《古史論文集》第一冊。

1980 年 12 月 25 日，顧先生逝世。之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支持下，王煦華與顧潮、顧洪三人負責顧先生遺著的收集整理工作。經過多年翻覽爬梳，鈔錄校訂，至 2005 年基本完成《顧頤剛全集》的整理工作，計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冊。茲列其總目、內容提要於下：

顧頤剛古史論文集 十二卷，十三冊

《古史論文集》是《顧頤剛全集》最爲核心的內容。其中卷一至卷四爲“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論述和對於古史傳說及夏、商、周至春秋史實的考辨；卷五、卷六爲古代民族和疆域的探索；卷七至卷十一爲古書真偽、內容和著作時代的考訂，其中卷十（上、下）所收的《尚書大誥譯證》，是顧先生晚年最爲重要的著作；卷十二收入《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國史講話》、《當代中國史學》、《中國史學入門》四部專書。

顧頤剛民俗論文集 二卷，二冊

顧先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大眾文化積極態度的影響，把民間的歌謠、戲劇、故事、風俗、宗教和傳統的經學、史學置於同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題材。此部分除收入《吳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三部專書外，還包括有關歌謠、風俗、民間文藝等的序跋與論述、探討等。

顧頤剛讀書筆記 十六卷，附篇目分類索引，十七冊

顧先生治學，勤於作讀書筆記，從 1914 年起至 1980 年

逝世，從未間斷。六十餘年積累了近二百冊筆記，約六百萬字。這些筆記是顧先生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容涵蓋中國古代文化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思想各個層面。此次收入《全集》，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的基礎之上，又增加了兩卷：卷十五，顧先生早年北京大學求學時代的筆記；卷十六，《浪口村隨筆》、《史林雜識初編》及筆記拾遺。

寶樹園文存 六卷，六冊

顧先生一生所寫文章，除收入《古史論文集》、《民俗論文集》以外者，均收入該部分。寶樹園原係顧氏先祖所建花園，先生蘇州故居即建於此園舊址，故以名集。其中不免“瑣屑之言”，甚至包括一些啟事、廣告、合同等。依照分類編年的原則，《文存》分為“學術編”、“教育編”、“邊疆與民族編”、“文化編”、“政治及其他編”五編。

顧頤剛書信集 五卷，五冊

顧先生交往遍天下，一生留下大量書信，此次所收約一千八百通。其中一部分是原信（包括家書七百餘通），另一部分是錄副本，還有一些是底稿及為數不多的發表於報刊者。這些書信所反映的不僅是顧先生個人的歷史，也是當時學術界、文化界眾多學者的歷史，更是當時社會、時代的真實反映。

顧頤剛日記 十一卷，附人名索引，十二冊

顧先生日記始於1913年10月，自1921年起至1980年12月17日（去世前八天），基本不間斷。日記不僅是顧

先生“生命史中最寶貴之材料”，更是近現代學術史、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代著述考 五卷，五冊

此書是顧先生早年為研究清代學術而作，對清代五百多位學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輯錄，並附相關的序跋及考證。其中一小部分曾經整理，陸續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上。此次收入《全集》，將《清代著述考》原稿全部影印，另將排印的部分附於原稿之末。

顧頤剛文庫古籍書目 二卷，二冊

《文庫古籍書目》著錄中國社會科學院顧頤剛文庫內約六千部線裝書，著錄方式按經、史、子、集四部，外加叢書、新學，共分六大類。並將書中各家題跋彙為“題記編”。未附著者、書名、題記批校者四角號碼索引。

《顧頤剛全集》自 2005 年陸續交稿，中華書局即成立編輯組，展開工作。期間，得到了袁行霈、陳祖武、王學典諸先生的支持與關注；又有常玉芝、辛德勇、劉俐娜、陳泳超、劉宗迪、施愛東、張廷銀、張越等先生義務為《全集》進行校對工作，不辭勞苦，謹致謝忱。

顧先生後三十年的學術生涯，與中華書局可謂休戚與共；今天我們出版《顧頤剛全集》，實現了顧先生“我一生寫作，應悉交中華書局”的遺願。

顧先生一生著述宏富，除收入該《全集》者外，仍有不少遺漏，尚需進一步搜集，俟條件成熟，續出《全集》補編。由於《全

集》卷帙浩繁，內容廣泛，行文各異，格式複雜，且寫作時間前後跨度逾七十年，所以整理方式不求統一，具體的整理原則請參看每集卷首《前言》。書中錯誤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0 年 10 月

前 言

父親顧頤剛先生一生治學，勤於作讀書筆記；從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起，至一九八〇年逝世，一直沒有間斷過，六十多年來積累了近二百冊，共四五百萬言。父親一方面用它搜集材料、思考問題，作為撰寫論文之基礎，一方面繼續錄下新發現的材料和新見解，補充以往論文的不足，甚至改變某些觀點，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他曾談到論文和筆記的區別及聯繫：“論文篇幅長，易生蕪累”，“筆記者，或長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簡潔之美。其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記錄人言，其態度可以嚴肅，亦可以詼諧，隨意揮灑，有如行雲流水，一任天機。此學術界之小品文也”，“為筆記既多，以之匯入論文，則論文充實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則著作不朽矣”（《浪口村隨筆》油印本《序》）。他的讀書筆記已成為他全部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

—

父親自幼讀書喜歡獨立思考，常把自己的主張批在書上，“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裏”（《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下稱《自序》）。“每從父、祖案頭獲見《困學紀聞》、《日知錄》諸書，愛其時出新義，勝於舊注；謬欲效顰，立冊以備發揮”（《史林雜

識·小引》，下稱《小引》）。早年常備有兩種筆記簿：一種便於攜帶的“袖珍筆記冊”，專門鈔撮見聞或偶然會悟的見解，有時則以紙片代替；另一種是正式的“紅格筆記簿”，即印有紅格的毛邊紙綫裝簿冊，作為最後謄清的筆記簿。這種記錄方式堅持終身。抗日戰爭前的一部分筆記，即因人事冗雜，不暇檢冊子，率書單頁紙上，置於木盒中，七七事變突起，他因宣傳抗日遭到通緝，匆遽離京，此盒遂不知去向，父親每念及此，輒嘆惜不已。

起初筆記內容不拘一格，幼年有一段時期看戲成了癖好，作過《論劇記》，“居然有始有終地寫了好幾冊。後來讀書方面的興致漸漸超過了看戲的興致了，又在《論劇記》外立《讀書記》”（《自序》）。現存兩冊一九一三年所記《檀痕日載》，大約就是《論劇記》的一部分。另存一九二〇年所記《游觀雜記》一冊，專記游覽北京西山及雍和宮。前面提到的《讀書記》，為一九一四年正式所立的讀書筆記。在其第一冊——《寒假讀書記》首頁上寫道：

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于同輩，或將誚我為狂。……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彘。

這段文字被引入《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它概括了父親一生讀書的宗旨。

父親早年的讀書筆記沒有什麼中心，至一九二三年，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始專力治古史，筆記內容逐漸成為有系統有目的性了。對於起初幾年的筆記，他自己評價說：

到現在翻開看時，不由得不一陣陣地流汗，因為裏邊幾乎滿幅是空語，全沒有自己學問上的建設。但一冊一冊地翻下

去時，空虛的漸漸變成質實了，散亂的也漸漸理出系統來了，又漸漸傾向到專門的建設的方面了，這便使我把慚愧之情輕減了多少。因此使我知道，學問是必須一天一天地實做的，空虛和荒謬乃是避免不了的一個階級；惟其肯在空虛和荒謬之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方有充實的希望。又使我知道，我現在所承認為滿意的，只要我肯努力下去，過了十年再看也還是一樣的羞慚流汗。所以我對於我的筆記簿始終看作千金的敝帚。（《自序》）

他堅信學問是一點一滴積累而成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無頓悟的奇迹，因此立志用全力在細磨功夫上，摒絕僥幸取巧之心。後來他總結自己的治學得益于筆記時說：

所以尚能從事于考索之業者，只緣個人習性樂于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厭煩，一登于冊，隨手可稽，予蓋以鈔寫代其記憶者也。（《小引》）

可見作讀書筆記正是父親治學的重要方法和鮮明特點。

二

父親曾多次說到，他一生治學目標，就是“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縱觀全部筆記，其內容都與這一主題緊密相關。

父親認為，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為探究古史真面目，他對《尚書》、《詩經》、《史記》及《左傳》、《論語》、《孟子》、《墨子》等書用力最勤。

筆記中長期注意搜集有關《尚書》的性質、名稱、篇目、亡佚情況、傳本、語言文法、歷代研究等方面的材料。除直接材料外，還摘

錄了許多用以比較研究的間接材料。三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學編《尚書研究講義》，著力于《堯典》，作了大量札記，以證明它始作于戰國，修訂于漢武之世；五十年代初，在上海誠明文學院教授《尚書》研究課，正值史學界討論西周社會性質問題，他決心將《尚書》徹底翻譯出來，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中的一個課題供給確實可靠的材料，故對《周書》諸篇的道德觀念、等級制度、語言文字等方面頗下工夫。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將《尚書今譯》納入出版計畫，為超過三十年前譯《盤庚》的水平，特立《讀尚書筆記》，從多方面潛心探研，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共成七冊。

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就發表過研究《詩經》的文章，稱它“可以算作中國所有的書籍中最有價值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以後仍不斷探討和極力恢復其古代樂歌的本來面目，筆記從《宋書·樂志》、《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等書中摘錄了不少樂歌，還搜集了古今樂曲和戲曲的演奏與唱法，進行對比，尋找周人樂詩在起興、和聲、重疊、尾聲等方面的規律，以及徒歌與樂歌的關係。五十年代為整理出版姚際恒《詩經通論》，亦作了大量札記。

父親在三十年代標點過《史記》。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又應中華書局之邀標點《史記》，更將其精讀一遍，就《史記》的來源、體例、傳本、舊注、後人增改和評價、司馬遷行年以及如何進行現代標點等問題廣搜博徵，留下不少精闢的議論。

父親始終重視周秦諸子及《左傳》、《大戴禮》、《國語》等典籍中的古史傳說，並認真辨析諸說異同、之間的聯繫和演變的原因，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作具體的論證。筆記所輯有關黃帝、少昊、唐堯、虞舜等古帝的材料尤多。如對於少昊氏，他早年集材，重在論證少昊金天氏是王莽、劉歆之徒為改朝換代的需要硬插進古帝王系統的；後期深入研究《尚書》中的鳥夷族，集材說明少昊為東方民族鳥夷的宗神，亦是其崇拜的鳳鳥圖騰。不同時期側

重點不同,研究的方法和材料都有新的突破。

父親從小喜歡看戲,受到戲劇故事變化的啓發,很早就有志于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為系統的敘述。除有關京、崑及各種地方劇種藝術形式的札記外,筆記中更多地記錄了各種戲曲故事,以及不少中外神話傳說,從中尋找故事變化的背景及規律。他對民間的鬼神信仰、婚喪巫術等風俗十分重視,冀圖以此說明古史傳說的形成、揭示古代社會的真面目,同時也為戲曲發展史、民俗學等研究聚集了豐富的資料。

古地理與古民族的札記,是筆記的又一重要方面。如果說,關於古代疆域觀念、古代州制、華夏民族的形成與古代蠻夷戎狄的關係等方面的材料較多地體現在一些重要論文中,那麼,對於傳說時代的地理、古代郡縣、都邑及古民族的札記,則反映了父親不斷深入的思索和研究。一九五三年,上海地圖出版社委托他與章丹楓先生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九五七年與侯仁之、譚其驤等先生一起編輯《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這期間集中考慮了有關傳說中堯、舜、禹的生卒地及活動區域、夏商周三代都邑及疆域的問題。

例如夏代疆域,他認為其中心應在河南南部,而後擴大至山西。又從西北多“大夏”之名推斷夏代的西境以及夏亡之後夏人活動區域西移的踪跡。

對鳥夷族活動區域及遷徙分化情況,是父親後期著力研究的課題。他將古文獻、古文字和民族學的材料融會貫通,說明其為古代中國一大民族,曾占有沿海一帶,跨《禹貢》揚、豫、青、徐諸州,延及冀州者則為夫餘;風、偃、嬴、媯等姓皆其分支;唐、虞、商之為東夷,亦即鳥夷;周公東征之攸國亦為鳥夷之一。

這部分札記的內容,在文獻範圍之外更有實地考察的心得。抗日戰爭時巡遊甘肅、青海,以臨夏小積石山證之《禹貢》“導河積石”必為此山而非今青海之積石山;六十年代初歇夏呼倫貝爾,三至草地,以牛群的蓄養情況證之《詩經》“駉牝三千”為古人大量蓄

養牝牛馬。他曾說：

考據之業，搜集書籍證據，以多爲勝，此清人之成法也。……予性好遠游，從實生活中發見可以糾正前人成說者不少，于是超出都市而入農村，超出中原而至邊疆，以今證古，足以破舊而立新，較之清人舊業自爲進步。（《湯山小記》三《序》，一九五七年六月）

這是對自己研究方法的公正評價。

“名物制度”爲傳統經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父親以新的觀點和方法，留下許多精彩的議論。他主張以淺近民族之禮來研究中國古禮的產生及其內容，對古代宗法、祭祀、田賦、兵刑、官爵等制度給予新的解釋。

他將《曲禮》之天官系統與《周禮》官制進行對比，搜集中外古代巫祝之地位由尊而賤的材料，證明《曲禮》以天事爲先，人事爲後之說，必非作者之想象，視《周官》、《洪範》更符合于古代之實際。

他注意搜集姓氏稱謂方面的材料，尋找姬、姜、姒、己、姚、媯、嬴諸姓間的關係，以探究古代民族的來龍去脉。

父親青年時期曾編輯《清代著述考》，尚未作完，筆記中還在繼續搜集材料。自從以全力從事考辨古史之業後，更以疑古辨僞爲中心，闡述經學的大勢與今日的任務，輯錄歷代學人及其著述情況，以便對經學作一總的清理。筆記中還保存了不少他對古籍整理的設想和意見、各個時期的工作計畫以及古史研究課題；保存了一些因戰亂或政治運動而損失掉的往來論學書札，它們是古史研究及近代學術史的寶貴資料。

由于父親出生于江蘇蘇州，故筆記貫穿了吳中史蹟、地理、文藝、風俗、人物、史志諸方面的內容，形成讀書筆記的獨特風格。

三

父親一生追求專心讀書治學的生活，時常爲自己多讀書、多作筆記而欣喜，也爲忙于人事應酬或因戰亂干擾荒疏了筆記而惋惜。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八九年裏，在燕京大學任教。一九三〇年，他銳于思辨，急欲立一系統，故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一長文發表，當時所記，皆就想到的問題匆遽間寫數行，使無遺忘而已。次年全力研究《堯典》，連帶研究漢史及《詩經》；而欲采禪讓制則必先及世官制，故對《左傳》資料亦多擷取。那時的筆記，最短兩三天即寫滿一冊，學問可謂勇猛精進。

抗戰中輾轉于西北、西南，無法再作系統的研究，筆記多有間斷，或一兩年才寫畢一冊。那段時期不少冊的序文中都流露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怨憤之情。

一九四八年底，至上海大中國圖書局任編輯工作，結束了一時期內教課、交際的忙亂生活，按日讀書寫作，心有所得，又作札記。

五十年代初任職較多，又歷各種政治運動，讀書時間有限。五三年元旦，因養病得覽書，時有新得，愈後一一寫入筆記，一月之中竟得兩冊，使他驚嘆：“此予三十年前之生活也！”（《法華讀書記》八《序》，一九五三年三月）

一九六四年夏，携書稿于青島療養院作記。醫生護士每加勸阻，老友王伯祥先生亦移書相勸。爲此他說：“良友之言，安敢不受。特予讀書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筆記則猶行雲流水，隨筆書寫，異于爲文之集中精神。苟并此而不爲，我之爲人不將如行尸走肉者幾希矣。”（《愚脩錄》九《序》，一九六四年十月）筆記之于父親，如空氣陽光之于生命，須臾不能相離。

父親珍愛自己的筆記，精心爲之命名。其中多以彼時所居之地名者，如《瓊東》、《景西》兩雜記，即因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學工